◆观 点

从每一起追究强化责任伦理

近期有两条消息，都与责任的追究有关：一是造成伊春空难的机长齐全军因犯重大飞行事故罪，被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是呼格吉勒图案原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

追责问责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有些时候、在某些领域却成了稀罕事。比如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要么是失职渎职，要么是刑讯逼供，案件一旦纠错，就理应对相关责任人展开调查。但据媒体对几年来十起冤案所作追责盘点，发现只有一起的刑讯逼供民警获刑，另有两案进行了组织内部追责，但“详情不便透露”，其他都未曾提及责任追究。

追责问责难，有时候是责任难以界定，有时候是内部人相互理解与同情、相互宽容与庇护。就拿冤假错案来说，有些人很同情冤假错案责任人，甚至同情刑讯逼供者，认为其中有着“历史”与“制度”的根源。个人刑讯逼供的刑责一笔勾销。

正因为我们经常性地不追责、不问责，社会上很多职守的责任被豁免了，责任链大面积断裂。责任的追究，很多时候需要行政的力量和政治的体制机制，但现在官员能上不能下，很多人宁愿被人骂，也要赖在官位上。结果上梁不正下梁歪，在社会上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今天我们似乎已然忘了，人类社会打一开始就是一个责任社会，正是责任对每个人的角色构成约束，从而把无数人类个体黏合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诸如政治的、契约的、道德的责任形式，形成复杂的社会责任链，在赋予个体以权利的同时，规定了他的社会职守。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一旦责任链松动，人类损失将几何级数增加。

要想把每个人应担的责任落到实处，必须强化我们社会的责任伦理，让大家都明白，担责理所当然，不担责者可耻。责任伦理在中国古已有之，俗话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等，说的就是敢于担当。现在强化责任伦理，不过是光复旧物，重振古风。没有责任感，实际上是不具备作为现代国家公民的资格，这应当成为常情常理。

重振责任伦理，不仅要强化伦理的观念，而且要倡导行动主义。坐而论道是不行的，必须从每一个具体案例入手，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让责任链“活”起来。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必须首先在政治领域强化责任伦理，谁不负责任，谁的责任环节断裂了，谁就下台以示负责。

一起事故，厘清责任主体，明确担责程度，需要详实公正的调查研判，当然需要时间，但这不意味着无限拖延，靠时间来稀释责任，等待人们视线转移而放弃责任追究。也就是说，如果一起事故和错误长时间无人担责，这种现象也应该被问责。

当然，追责问责有一个问责主体的问题，由谁来问责，这关系到责任链的激活。老实说，依法依规，谁来问责是明确的。但鉴于“权为民所授”，大小权力必须对人民承担责任，这是问责的终极动力。（2014年12月20日《长江日报》杨于泽）

放权回归本位赋权方能激发活力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定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意见》明确突出了扶贫济困、坚持改革创新、确保公开透明、强化规范管理等原则，提出到2020年，慈善监管体系健全有效，慈善行为规范有序，慈善活动公开透明等目标。

自2005年慈善事业发展正式写入国务院文件以来，十年再度发力已经充分体现出国家重视，为此引发业内强烈关注。恰巧的是，这段时间里，陆续有高校与研究机构发布民间版的慈善法方案，诸如2014年12月14日，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慈善法专家建议稿，这是首部慈善立法专家建议稿公布。

国务院《意见》的发布，与现阶段各个版本民间慈善法建议稿的活跃发布，俨然形成了官方与民间的一个呼应和互动，都为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想象。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因为法律与政策的滞后，也带来诸多发展桎梏，而且在慈善事业遭遇发展困境与问题时，很容易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同时也有个别人和机构行走在慈善事业的灰色地带，打着慈善和公益名义招摇撞骗，这些问题都说明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制度保障。

但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议开始，到2013年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慈善法已在漫长的立法道路上踯躅近十年。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一直都秉承着开门立法的姿态。如今在有了《意见》之后，我们更有信心去期待慈善法能够尽快正式亮相，从宏观指导意义上的《意见》完善到可执行的具体法律。

不过正如业界人士指出的，此份文件稍显保守，四项举措中三项是“规范管理”，有归复“政府主导”导致明促暗管之嫌，会对慈善组织的掣肘大于利好。基于此，我们认为，在随后的慈善立法中，直至形成最后的慈善法，应该形成官方与民间的基本共识，即从全社会的慈善事业着眼，让慈善法成为促进社会活力与提升社会自我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在慈善立法的过程中，除了继续延续开门立法的良好做法外，还应在价值和理念上意识到将要出台的慈善法，必须促进而非限制、是开放包容而非紧缩约束、是充分信任而非忧心提防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激发全社会更多的善，让慈善事业更好地发展，激发社会向善的蓬勃活力，促进社会力量的发展、成熟。

在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上，首先应该从政府放权、逐步退出社会慈善领域的角度出发，因为对于政府职能来说，政府更多承担的是福利保障，慈善就应该更多地交给社会的非营利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这也是全世界慈善事业发展较好的国家的基本经验，让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组织去解决。其次就是要培育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让第三部门和社会领域真正能够胜任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在方法上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指出的，培育扶持需要做到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退出募捐市场；二是政府在社会组织登记方面放开或降低门槛；三是官办的非营利组织、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将资源能够真正地流向社会领域。总而言之，就是政府放权回归它本来的职能范围，同时又赋予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的权利，激发社会活力。（2014年12月20日《南方都市报》南都）

◆纵 横

年度热词也算一种民意表达

“汉语盘点2014”活动结果近期在京揭晓，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专业方主办、大众评选，列出年度十大流行语、新词语、网络用语。“法”“反腐”分列年度国内字、国内词，“依法治国”“新常态”“APEC蓝”等社会热词和“有钱就是任性”等轻讽刺意味的网络热词都入选。

“汉语盘点”可不仅仅是一种泛娱乐性的文化传播活动。比如“APEC蓝”“依法治国”反映了民众对改善现状的巨大期盼，“蛮拼的”“我也是醉了”显现出乐天派小民的自我解嘲。无论是看看评选结果中略带自娱调侃、幽默讽刺小快乐的热词，还是归因于它的大众参评机制，“汉语盘点”都显现着倔强的草根性和天然的民间基因。

话语场在发生变化，得益于网络的发展，人人手握传播权，使用最熨帖自己心意的词，当人们觉得现有词语不够表达所需时，就造一些出来，然后反复出现在新闻、论坛、空间，人们口耳相传。这些年度词被选中代言民意传用开来，不再是话语权的集中传播和被代表，而是新的民意表达，是一种群民语言学机智的交会，盘点从年初就已开始，绝不终止于年末。

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看，年度汉字的信号是一种老百姓对生活期望值的一个期盼、一种公众的情绪书写表达。比如从十大网络热词的历史纵度看，2012年的“高富帅，白富美”、2013年的“土豪”、2014年的“有钱就是任性”，就以一种良性表达和调侃心态，在演绎鲜活的社会现象和真实的阶层诉求。

这些“年度热词”无疑具有相当广阔的概括性和高浓缩性，借助大数据分析，在讲求高效率和资讯膨胀的信息社会里，实现了用最突出、简练的方式，来表达和代表一种普遍认同。某种程度说，草根阶层用年终盘点，形成了另一场域的社会共识，这也是“年度汉字”被评选出来后，具有的解读和样本分析意义之所在。

年度词语本质是一种批评和书写，局限于用语义内涵去指称风云诡谲千变万化的时代，难免只能是挂一漏万。更遑论，它能否真正被纳入了政策变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决策借鉴。民意场域里解读和审视中国，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价值博弈，其结果不应是胜负而是和谐。（2014年12月23日《浔阳晚报》段久惠）

◆史海钩沉

汉文帝“妙用”道家智慧

道家思想问世后，便对政治、养生、思维等产生影响。汉文帝以力量薄弱的藩王身份继位，初登皇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而黄老学“卑弱以自恃”“以弱胜强”的特点适合他“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的特点，被其奉为“南面君人之术”。

无欲无争 保全性命

汉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都采用了“黄老”道家学说。首先这与他们的家教有很大关系。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好《道德经》而深受其影响，在母亲们的教育理念下，道家思想成为文景二帝治国思想的主要来源。时代环境对于道家思想的青睐也影响了二位皇帝。在楚汉相争时期，张良、陈平、韩信等人灵活地运用道家思想，才使楚军大败、汉政权得以建立。而秦末酷法暴政则令人深恶痛绝，在反思其深层原因时，道家思想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并融入包括文帝在内很多人的思想深处。

汉高祖刘邦死后，政权落入其妻吕雉手中，她想将帝位转给自己娘家的人，于是，大开杀戒，将刘邦的儿子几乎赶尽杀绝，只有小儿子刘恒幸免于难。这不是吕雉心软才刀下留人，而是刘恒及其母亲“无欲无争”的姿态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刘恒母亲薄氏知道宫廷斗争的残酷现实，便苦读《道德经》，领略道家思想的精髓，走上清净无为的道路。在母亲潜心寡欲思想影响下，刘恒或无意与其他皇子争夺继承权，甘愿被分封到西北边疆、毗邻匈奴的荒漠贫瘠地带为代王。刘恒在没有其他皇子愿意来的偏僻地方为官，几乎被朝野遗忘，正因如此，才躲过了吕雉的迫害。

吕雉死后，大臣们在寻找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时发现，皇子只剩刘恒一人了。于是，这位远在边疆、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便被请到长安，是为汉文帝。

谦卑下位 获得皇位

刘邦曾谈过自己能够虚心听取能人的意见是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他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自己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且百战百胜，自己不如韩信。以“谦卑”之心知人善用，才是自己取胜的根本。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淡泊名利、潜心学道、在边塞为代王的刘恒。当他听说长安来人要迎接他回去当皇帝时，仍旧保持着谦卑下位的姿态。他请示母亲，是否可以去当皇帝。母亲帮助他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时是中央政权最混乱的时期，且朝中大臣多是刘恒父辈，很难驾驭。如果冒然前去，可能遭到杀身大祸。于是刘恒派人前去长安打探消息，一了解实情，二为延缓时间来获取人心。之后，刘恒斟酌再三，才最终决定回长安继位。

此时中央政府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周勃手里，周勃对于刘恒的弱势了如指掌。对于刘恒来说，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对待这样的关键人物须非常慎重。当刘恒从边塞来到长安城外的渭桥，周勃率领百官跪下接驾，刘恒也立即下马跪下还礼。这种礼节的选择，正体现了《道德经》倡导的“谦德”精神。在渭桥过礼之后，周勃想单独与刘恒说话，刘恒觉得私自与周勃交谈，可能引起百官误解，于是，便拒绝了私人谈话，体现了《道德经》所谓“无私”的运用。在周勃将玉玺送上后，刘恒仍然谦逊地说：“玉玺我可以代管，但这个皇帝不一定非是我来当不可，可以为皇帝的人很多，此事过些时日再议。”刘恒运用了道家“不用之用”的智慧，避免了不必要的妒忌发生。

刘恒收下玉玺后，又等了九个月才登基，这一是考虑到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自己大的、办事能力比自己强的，要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登基才能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争取获得那些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将军们的支持，自己的政权方能真正稳固。在一切条件完备时，刘恒才荣登皇位。

躬行节俭 增益利民

老子有所谓“三宝”的说法：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除了待人待物的“慈”和“不敢为天下先”之外，在待己方面需“俭”，只有躬行节俭，才能增益利民，而这一点尤为汉文帝所注重。《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文帝带头为天下人作敦朴的示范，并制定一些节俭的规章制度，推动自上而下实行。据说他的一件黄袍，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之再补。他尽量减轻刑罚，减轻赋税，宽大包容，为人称颂。

时人贾山曾说，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所有这些举措，均体现了黄老道家“尚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其目的是体谅百姓，与民同乐同忧。西汉后期的刘向因此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此后直到景帝、武帝初期的五六十年间，因在政治上贯彻道家的“谦卑”“无为”之智慧，而使得国强民富，为汉朝四百年政权打下了深厚根基。（2014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施保国）

◆评 论

农业现代化 如何破解难题

近期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2014年“三农”绩效进行评估总结，对2015年“三农”工作重点作出部署。虽说农村工作会议与一般人的关联度远没有上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般直接，但农业是物价稳定的基础，农村是国家的广阔天地，农民安康是社会安稳的前提，因此关注国家的“三农”现状和趋势，就是关注我们的切身利益。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牧副渔全面丰收增产，让全社会粮食及主副食品供应丰富且价格稳定，农民增收实现“十一连快”。农业农村发展延续11年来，总体状态未有继续恶化之势头，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稳控物价提供了支撑和底气。

我国农业资源禀赋不足，人均耕地和水资源分别只占世界均数的1/3和1/4，为收获同样的单位粮食产量，我国使用的化肥数量是世界均数的4倍，使用农药的利用率不足世界均数的一半，造成地力持续下降，农业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主要农产品虽然连年丰收，但农产品价格长期国际国内倒挂，“黄箱”政策（导致农产品价格扭曲的各类涉农政府补贴）使用已逼近极限。

再有，由于人多地少，致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务农对农村青壮年没有吸引力。眼下，2.7亿农民工占农村总劳力约一半，而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另一半农村劳动力，仍有近六成没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谁来种地”的矛盾有增无减。总体而言，当下我国农业同时面临生态“天花板”、补贴“天花板”和劳动力年龄“天花板”的三重挤压，若再不借助目前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总体稳定趋好的有利时机，尽快补上农业现代化之短板，避免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由此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以及现代化进程受阻，并非危言耸听。

何以破解阻碍农业现代化的“紧箍咒”？唯有深化农村改革。如果说，2004年以来的前十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主要致力于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并初步使农业恶化态势得到遏制且逐步有所好转，那么，以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为起点，在未来的十年间，在继续巩固和确保农业增产及农民增收的同时，则要重点破解农业现代化的难题。本次农村工作会议，很可能是我国农业由以往重点确保增产增收，转向科学种田、精耕细作的一道分水岭。

这次农村工作会议发出的“五大信号”中，最为城乡青年一代及城市工商资本看重的信号是，“第六产业”已经呼之欲出。当代前沿经济学把一、二、三产的整合互动称为“第六产业”，主要是把市场产业链、价值链、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领域，实现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服务业的彼此融通，从而实现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民收入和农业附加值的三重提升。“第六产业”的主旨是拉伸和延长现代农业的产业链，在过程之中形成资本、技术、物流、服务、农研、种田能手互相糅合的“链式化学反应”，使农业由国家的“补贴产业”转变为“新兴产业”，成为中国经济2.0板块中一个新的增长极。

农业要从传统的第一产业涅槃为“第六产业”，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土地入股、土地信贷抵押、土地规模化经营等制度创新，成为吸引城市工商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的先决条件。这一系列围绕土地展开的探索性改革，都是为了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进行规范化经营权流转。总之，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年轻一代并非隔山隔水隔肚皮，我们乐见一批脚踏实地的有志者，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圆自己创业兴业的奋斗梦。（2014年12月25日《北京青年报》特评）

◆文 坛

警惕“局部性误诊”

在饥饿年代，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被饿死的风险，因而千方百计要吃饱肚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少吃一顿饭，强烈的生存焦虑就会随之而来。但当温饱代替了饥饿，我们对肥胖的风险却不是那么敏感，因为你的身体不是因为哪一顿饭而胖起来的，它是长期地、缓慢地、不知不觉地储存了过剩甚至是有害于自身的能量。

正因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和威胁是以这种“延迟的危害”面目出现的，所以它不会在最初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当它还只是“潜在的危害”时，人们很难感受到它对于人类生命及地球环境的不可抗拒的威胁。

而且，现代性的风险和威胁，往往在最初是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我们对雾霾天气的恐惧与厌恶程度，远远大于对水及土壤中积累的毒素和污染物的担忧，因为后两者不太容易被直接感知到，而实际上它们比雾霾更难治理。由于潜在风险的不可感知性、潜在伤害的不可见性，它们最初被我们知道，是出于科学家的解释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因此，它们也更依赖于这两者对潜在风险的界定和建构，从而使得某一类或某几类风险可以被突出、被夸大，也可以被压制、被消减。比如放射性污染、现代文明病等等，它们可能会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也可能被人们漫不经心地忽略。

“生态治理”问题，林业部门认为是林业的事，水利部门认为是水利的事，环保部门则主要搞“三废治理”，但实际上，“生态治理”不但是生态环境问题，还是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个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的问题，任何对于单一的原因及后果的过分强调，都是一种典型的“局部性误诊”。（2014年第24期《南风窗》石破）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